被遗忘百年的中国劳工

去年9月，退休的英国房地产经理约翰·德·露西在家中翻箱倒柜，被一个陈旧的木箱险些绊倒。

约翰对木箱颇为好奇，打开一看，是祖父威廉·詹姆斯·霍金中尉40年前留给他的珍贵遗物——数十张玻璃幻灯片。

他的祖父是名一战英雄，而这些玻璃幻灯片中记录的是一战期间，远离家乡5000英里的中国劳工的真实影像。

数十年来，中国劳工在英国一战时期的付出少有人知，约翰家的箱子重启了一段百余年前的记忆。“我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，根本不了解这段历史。”约翰说，“现在我知道，华工是一战中的重要力量，很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。”

11月12日，英国第四频道电视台播出了纪录片《英国被忘却的军队》，时长一小时的纪录片展示了有关一战华工的信件、日记和文件，从华工后代和历史学家的口中追忆这段未被记录的历史。这是英国主流媒体首次制作纪录片，来肯定华工对一战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。

在民间，英国华侨华人在3年前发起了一场名为“确保我们铭记”的全国运动，要在英国为一战华工建立一座纪念碑。发起人之一、英国首位华人市长陈德梁称，“我们想要让所有人铭记，早在一百多年前，华人群体就对英国、欧洲乃至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。”

作者：张珺 石润乔
《VISTA看天下》编辑出版

“三百大洋卖了命，至死不能回家乡”

“带着至少5年的合同去欧洲吧！你的年收入将达到2000法郎，回来时将成为大富翁。”

1916年至1918年时，这样的广告遍布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、江苏等十多个省区的招工点。

山东莱芜牛泉镇上峪村农民毕粹德看到了这则广告，他对欧洲在哪，要去做什么茫然无措，只知道可以赚钱，唯一的遗憾是即将错过家中不到一周岁儿子的童年。

和毕粹德一样，当时被招工广告“蛊惑”的多是贫困或无地农民，他们怀抱着同一个梦想——“发财致富”。

几年前，1914年7月，一战爆发，战争初期战局复杂混沌，此后又变得漫长而惨烈。当时，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在德国的步步紧逼下损失惨重，仅仅1916年7月发生的索姆河之战，英军伤亡就达40万人。

随着战争的演进，协约国一方面临着严重的人力资源危机——前方战线缺人，后方急需劳力。难以为继时，英国一位军官提出，“为什么不用中国人？”

那时，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已被革命者推翻，可新生的中华民国刚刚历经三载，战乱、政争、贫困仍在继续。

灾荒和动乱使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仍处于极端贫困，尽管更多人是抱着“有去无回”的悲观心态，英法两国招募时提出的“丰厚”待遇仍让很多华工怀揣着“出国发财梦”。

而对政府而言，一方面，为了防止战火蔓延到中国，民国政府一开始便发表中立宣言并公布24款“局外中立条规”；可另一方面，一直在战败和割地赔款中循环的政府也想有所作为，提高国际地位，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。

筹划着“皇帝梦”的袁世凯曾在1914年8月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表达中国派兵参战的愿望，但没有被采纳。1915年，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提出“明守中立，暗示参加，以工代兵”计划，长期研究一战华工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贾珺说，此举梁士诒的目的是“一可从德人手里夺回青岛，二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，三可在战后和会上占有一席之地，直接参与国际事务”。

当年年底，法国人陶履德打着进行农业开发的旗号来到北京，实际上他的真实身份是法国陆军部中校，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与北洋政府秘密谈判中国劳工招募事宜。后来，北洋政府与法国达成协议，由梁士诒控制的惠民公司专门负责招募及运送华工。

与此同时，英国虽然在1915年拒绝了中国人的建议，但私下里，他们还是利用其在山东威海卫的租借地，以及教会网络，悄悄地在山东和河北两省招募中国人。

这些招募计划一开始都是半官方的，直到在1917年中国宣布参战后，开始转由中国政府劳工部组织劳工输出。

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地参与西方世界的内部事务。从1916年5月输出第一批劳工开始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11月，相继有14万华工远涉重洋，4万余人为法国军队服务，9.6万为英国军队干活，他们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，开始了他们曲折艰辛的劳工经历。

华工们剪掉长辫，登上码头，在夕阳中对着来送别的亲人们挥挥手，哼着《华工出洋歌》，甚至是敲着锣鼓、放着鞭炮登上了一场未知又充满死亡危险的旅程。

“下了太平洋，想起老爹娘；三百大洋卖了命，至死不能回家乡。”提到当年出国时的感触，来自山东的劳工樊明修曾说。

“像牲畜一样被推挤到了船舱里”

1916年11月15日，山东荣成的毕绪忠拿到了华工第00001号登记单，成为一战时英国招募的华工第一人。

他到达威海卫英租界，排起长队，脱光衣服，接受体检。当时的检查很是严格，除了一些传染性疾病外，皮肤病、沙眼、痔疮及牙齿不全的候选者都被刷掉。

毕绪忠通过重重考验，英国的医生为他驱除了虱子、打了疫苗，他脱下旧袄，换上制服。工作人员又拿来一纸合同，仿照法国，合同上面也写着，“不得在危险区内雇用中国人”“中国劳工的待遇与英法两国工人平等”——虽说“平等”从未实现，但参加一战的中国劳工与此前被称为“猪仔”的出国劳工有了根本不同。

只不过，华工们多是文盲，面对着密密麻麻的文书，只能按下手印代替签名。他们不一定都能读懂合同条款，只是有着最朴素的理解——出去工作三到五年，包吃包住，每月能挣十多块大洋呢。

当时的一块大洋能买30斤上等大米，将近10斤猪肉，即便是最壮的山东大汉，干体力活儿的月收入能有三四块大洋就很是不错。

据华工后人崔树新回忆，当时赴欧的父亲崔志卿每月会往家寄30块大洋，足以保证一家老小衣食无忧——不过，崔志卿是副翻译兼正工头，和那些大字不识的底层华工区别很大。

心存期冀的毕绪忠和其他华工们穿着统一的制服，头戴统一的宽檐帽，背着统一的背包涌上甲板。本来能承载几十人的船上，站满了成百上千的华工，“像牲畜一样被推挤到了船舱里”，远赴欧洲。

1917年2月24日，法国输送华工的“亚瑟”号，在地中海被鱼雷击中，当即有543名华工遇难。正是因此，为保证安全，也为了保密，英国招收的华工多采取假道加拿大的航线，即从中国向东，横穿太平洋抵达加拿大维多利亚，然后换乘火车从西向东穿越加拿大全境，再乘海轮，横越大西洋到达欧洲。

这条路程几乎穿越了大半个地球，一般要用时两个月左右。这些从未乘过船的中国劳工躲在狭小阴暗潮湿的船舱，吃尽了苦头，有人吃不惯船上的罐头，饥肠辘辘；有人晕船得厉害，跳海自杀；有人得病死去，被抛尸大海。

一路颠簸，华工们终于抵达英国，但他们也自此没有了名字，只得到一个刻有编号的黄铜手镯，是为发放工钱、分派任务的依据，直到合同期满归国才能取下。

最艰苦、最繁重的工作

一战西线战场，随着大批先进武器的发明和投入，战争的规模远远超过以往。战场近乎屠场，数次大战役被称为“绞肉机”。

刚上船的时候，就有中国劳工因为恐惧亲上战场而恐慌，英方组织者百般安抚，称中国人“不必进入危险区”，来给众人定神。

可到达欧洲之后，事情就起了变化。

“有些地方与敌人战壕相距不过50码。我们站在敌人战壕前挖战壕，战壕挖好后，英兵才进来，所以我们实际是在最前线。”时任第13营翻译的张邦永曾在《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断回忆》文章中称，这与威海卫时所签订的合同是不相符的。

当时，大多数人都被投放到前线，挖掘战壕、修筑工事、野战救护、清扫地雷、解运粮草、装卸给养……华工在前线从事的都是最艰苦、最繁重的工作。但凡战争所需，几乎无处不往、无所不为。

甚至在1917年法国皮卡第的一场战斗中，德军冲人英法阵地，修缮战壕的华工们不得不用铁锹、镐头与德军展开搏斗。援军赶到时，大部分华工已经战死。

华工们在轮船和火车上卸货，修建公路，铺铁轨，甚至在战争结束后还要做一些危险可怕的工作，即恢复现场秩序，挖掘死者，挪动尸体并把它们埋在战争公墓里，有的尸体被挪动时甚至已经存在了几年。

与法国用人的严守合同不同，英国对华工的管理是封闭制，在劳工合同中规定，中国劳工工作3年，每周工作7天，每天10小时。他们每年都有3天的假期，一天是农历新年，一天是端午节，一天是中秋节。轮班睡觉劳工休息时只能呆在营地——即使营地被德国人炮轰，他们也不得离开。

时任3营10连的华工严振盛曾称，生活常常是饥一顿、饱一顿。在战事吃紧和阴雨连绵时，即便是又烂又发霉的面条都不管够。“有一个阶段，我们竟7天7夜粒米未进，全靠挖野菜、吃萝卜度日。”

除了面临战争的死亡威胁之外，这些华工还遭受军队人员的歧视，而且必须服从“纪律”。在当时的英国人眼里，华工就像是“低人一等的苦力和智力发育不完全的儿童”，因此他们往往用棍棒加马鞭来督促华工干活。一位管理华工的英国军官甚至称，“你对中国佬越好，他们越不买你的帐，因而绝不能善待。”

为防止逃亡，华工们被禁止拥有平民服装，也不得进入咖啡馆和酒吧，甚至禁止使用英国人的厕所。

“中国劳工旅将被永远铭记”

不少华工在一战前后长眠于欧洲，法国、比利时等地都建有华工墓地。法国的诺莱特村华人墓地由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设计师约翰设计，共有800余个墓位，一些失踪者的姓名也被刻在纪念碑上，上面刻着“鞠躬尽瘁”“勇往直前”“流芳百世”“虽死犹生”等中英文题词。

可是招募了近10万名华工的英国军队却没有为这些中国人的付出做什么，在英国，他们被遗忘了一个世纪。

“这些被遗忘一个世纪的华工，是他们的贡献使英国和欧洲有了今天的和平。”陈德梁说。

他前后任英国地方议员12年，2009年成为英国首位华人市长，现在是英女王大伦敦代表副官。

2014年，英国华人社会论坛主席刘中庆向他提起华工的历史，当听到有543名华工还在途中就被炮弹击中时，陈德梁深受触动，“确保我们铭记”也在那时展开，目的是为那些一百年前受英国招募、远赴欧洲戰场作出贡献，却被英国遗忘至今的中国劳工立一块碑。

现在，陈德梁身为英国华人社会论坛副主席兼“确保我们铭记”建碑筹款负责人，据他介绍，纪念碑只在伦敦立一个，以传统华表的形式，预计纪念碑将高达9.6米，每一米代表一万名来欧洲的华工。纪念碑基座四周刻有浮雕，分别显示华工离开故乡，经过漫长的水路来到欧洲，参与工作和返回家乡四个场景，目的是展示华工的辛劳。

对立纪念碑的意义，陈德梁认为除了铭记历史，更有提高华人在英国社会地位的现实意义。“一百年前的华人苦力可以被歧视，今天的华人应该站起来，为他们平反。”他说，“我不希望我们的第二代、第三代在英国或是欧洲继续遭受不平等的待遇，继续成为被忽视的群体。”

11月11日上午，一战停战99周年，即英国阵亡将士纪念日，30多名华侨华人和英国友人来到伦敦和平纪念碑前，在纪念一战英军阵亡将士的一长串花环中，有一个上面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着“中国劳工旅将被永远铭记”。这也是英国首次在正式活动中纪念参与一战的中国劳工。

一战中十四万中国劳工赴欧洲战场